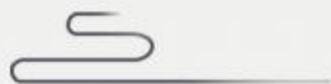


# 经济史话







## 大年初一挖“鱼鳞坑”

肖文奎 李志国 \*

站在周口店镇政府前面的广场向北瞭望，映入眼帘的“塔山”“大煤港”“二煤港”“磨盘山”“小东沟”等山，一片郁郁葱葱，满山的油松树、整齐的梯田、野生的野菊花等，为这些山头披上了绿色的毛毯。两条宽敞的大道可以行走汽车，通向山顶的一座雄壮的瞭望哨，是有关部门作为护林防火、巡逻检查的专用道和眺望各山的护林防火情况专用。以前的煤矸石堆和渣土堆，大小不等、深浅不一的臭水坑，现在已踪迹全无。

这些山的地下储藏着一一些青灰和青煤，老年间一些人在山上开采小窑，挖些青灰、青煤，卖钱维持生活，俗称“挖浅”。山上严重缺水，十分干旱。多年来由于缺乏治理，天长日久，每个山被雨水冲得大小不等、深浅不一的沟壑几条至几十条，雨后便成了干河沟，有的人行小道也被冲成了河沟。老百姓有句谚语是：“塔山载帽儿，别走沟壑小道儿。”意思是这个山

---

\* 肖文奎：房山区周口店镇农机站原站长

李志国：宁夏宁光电工厂原支部书记



顶一有阴云，别走这些干沟，随时有被山洪冲走的危险。

多年来人们一直想治理这些山，但由于没有水源，总是力不从心，也只好顺其自然了。

1958年，党和政府号召植树造林、治山、治滩，造福人民。周口店乡党委广泛发动群众进行讨论，群众认为：周口店地区山多树少，滩多水少，沟壑多平路少，“三多三少”的不良环境，影响人们身心健康，应该好好治理。乡党委根据群众呼声，决定治理“塔山”这一群山带。

治理塔山，一个主要的矛盾是水源问题如何解决。乡党委发动群众献计献策，根据大多数群众意见，决定挖“鱼鳞坑”蓄水保墒、栽树造林。

挖“鱼鳞坑”虽很简单，但它体现了群众的智慧。具体实施方法是由山的顶端横向错位挖坑，坑长1.5米、宽1米、深1米，坑距间隔3米，行距4米，形状像鱼鳞，坑的下沿扶起50公分高的土堰，起到拦截雨水的作用。林业主管部门制订了实施方案，由技术员指导实施。

为使村与村协同推进，统一工程质量标准，乡党委成立治理“塔山”指挥部，设总指挥、副指挥、质量检查组、宣传报道组、安全组。由乡团委承担具体实施任务。自此，以青年团员为骨干，发动全乡青年参加，成立治理“塔山”青年突击队，并成立“智囊小组”，协助青年突击队完成好任务。

乡团委提出，让“青春在奋斗中度过”“让青春释放更多灿烂的光彩”，号召广大青年积极参加治山的战斗。倡议发出后，



全乡青年踊跃报名参加治山突击队。全乡 5 个行政村，成立了 5 个“治山青年突击队”，5 个“智囊小组”，共计 250 多名青年突击队员，50 多名“智囊小组”成员，分别参加各村治山突击队。

为完成好治山任务，各村成立治山分指挥部，党支部书记任分指挥，经过充分准备，一支周口店乡治理荒山大军诞生了。

时间就是冲锋令，山头就是主攻高峰。突击队在乡党委的领导下，经过酝酿，决定开展破旧俗、树新风，过一个有意义的春节，即正月初一在塔山过大年，吃完饺子上山挖“鱼鳞坑”。这个倡议得到了群众的支持，广大青年积极响应。周口村团支部书记李淑芬，节前母亲计划带她去外婆家，团委的“破旧俗、树新风”的倡议发出后，她做通了母亲的思想工作，放弃了串亲戚的安排，参加了这次活动。云峰寺村团员王淑兰，为了参加这次活动，反复向父母做思想工作，推迟了相亲的日期，成为“破旧俗、树新风”活动一员。

1958 年农历正月初一的早晨 8 点钟，一支 300 多人的治山大军，雄赳赳地敲着锣鼓，聚集在京周公路上。总指挥、乡党委书记陈世民一声出发令发出后，人们高举着红旗，打着标语牌，喊着“治理荒山，造福人民”“治山治滩、为子孙后代造福”的口号，浩浩荡荡向周口店“塔山”的群山带进发。治山大军布满了东西约 5 华里长的群山，歌声、口号声、比武挑战竞赛声，响彻了上空，人们个个跃跃欲试。陈世民抡起了第一镐，这一镐是治理“塔山”工程的动员令，所有参战人员在统一指挥下，



开始了战斗。“定给秃山披绿衣”“治滩、治山、造福人类”“战胜严寒、治理荒山”的口号此起彼伏。战斗中，村与村之间，队员与队员之间，组与组之间，青壮年之间，各找对手，展开了比武挑战竞赛。周口村一位 40 多岁的壮年社员魏振华和本村的小青年展开了比数量、比质量、比互助、比安全的挑战竞赛。战斗中别人休息，他不休息或少休息，他说：“不怕慢，就怕站，笨鸟先飞”，他每天都和小青年一样完成工作量。最后，他被评为治山标兵。云峰寺村团员王淑兰，向团支部书记张久德提出了挑战，在他二人的带动下，全村 30 多名青年各找对手，掀起了挑战竞赛热潮。

榜样的力量无穷无尽。这次挖“鱼鳞坑”能够顺利进行，领导带头是关键。乡党委书记、治山总指挥陈世民，开工的头一天得了感冒，但他带病参加了战斗。数九天气，寒风刺骨，他只穿一件绒衣，但还是累得满头大汗，和其他队员一样完成了挖坑任务。他的行动影响了所有参战队员。周口村的共青团员付勇十分感慨：“书记真干，我们就得真追，撒着花儿干。”乡长、副总指挥李润义，年过 40 岁，他手磨破了，用绷带包上继续和大家一起干，他说：“磨出老茧就不疼了。”周口村一位 40 多岁的妇女张秀荣说：“李乡长管全乡的事，操全乡的心，每天还跟咱们一块干活，咱们要是没点实际行动，真是说不过去。”她从始至终都是提前赶到工地，最后离开工地。周口店村团支部书记康树林，腿有残疾，走路困难，乡里这次安排把他留在家负责其他工作，他得知后立即找到乡党委，



坚决要求参加治山战役，指挥部负责人见他态度诚恳、坚决，同意了他的请求。在工地上，他与其他队员一样，干在前面。共青团员王振启说：“康树林同志腿有毛病，但比别的同志一点儿不少干，除完成自己的任务，还主动检查质量和安全工作，我们要向他学习。”山口村团支部书记刘明元，在治理“塔山”战役中得了感冒，但他带病坚持到了战役结束，他说：“治山是为子孙后代造福的大事，我这点儿感冒不算什么，干活一出汗就好了。”在此次活动中他被评为优秀指挥员。

干群团结奋斗、齐心协力战严寒，克服了种种困难，战役第一阶段奋战 5 天，共挖“鱼鳞坑” 5500 多个。这些坑夏季蓄上了雨水，栽上了油松树，周口店“塔山”这一群山带，初步得到了治理。

经过了 20 多年的努力，周口店境内的大小山头已全部披上了绿装。过去的秃山、荒山、乱石山、“黑脸山”“白脸山”，变成了身披绿袍、脚踏草地、绿油油的俊美山峰，成了青山、绿山、红叶山。不少地方建成了旅游区，如黄山店的“坡峰岭”，车厂村的“九龙山”、娄子水村的“庄公院”等。每年的春、夏、秋季节，游客熙熙攘攘、川流不息，人气十分旺盛，为本地增加了旅游收入，带动了地方经济发展。

当下来到周口店，会让您永远留恋周口店地区的无限美好！



# 良乡卫星城规划建设 领导小组记事

张广文\*

2005年1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新规划提出有必要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年）所确定的“市区—卫星城—中心镇—一般建制镇”的四级城镇体系布局进行调整，构建“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以及构建“中心城—新城—镇”的城市空间结构。北京城市建设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房山区2019平方公里的土地全部纳入了房山新城的建设范畴。房山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从1992年开始的良乡卫星城开发建设，为房山新城良乡组团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

\* 张广文：房山区规划局原高级工程师



## 良乡卫星城的由来和总体规划的编制

1987年1月,根据国务院(86)164号文件批复,撤销房山县和燕山区建制,合并成立房山区区政府所在地仍设在房山城内。1990年3月31日,在房山区一届五次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北京市房山区1989—2000年经济社会综合发展规划》中,根据发展战略需要,提出了区府迁移良乡的规划设想,并于1990年10月由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完成了《北京市房山区区址迁移可行性研究报告》。1991年2月28日,房山区政府向市政府正式报送了《关于区址迁移良乡的请示》。在此期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年》编制完成,并获得国务院批准。在这个规划中,北京城市建设确定为“市区—卫星城—中心镇—一般建制镇”的四级城镇体系,包括良乡在内的14个卫星城也正式命名,良乡地区从此纳入了北京市卫星城的建设范畴。1992年11月,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下发[1992]首规办字第157号《关于〈房山区良乡卫星城总体规划方案〉的批复》,原则同意北京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的《良乡卫星城总体规划方案(1992—2010)》。从此,良乡卫星城进入了全面开发建设时期。

1998年5月,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市长贾庆林在视察良乡卫星城的建设时,提出了要把良乡建设成“首都卫星城的精品”,这就给良乡卫星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由市规划



院对总体规划进行了第一次修编。同时编制了《良乡卫星城中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两个规划方案于 1998 年 9 月完成，2000 年 3 月经市规划委批复，确定总体规划区域面积 78 平方公里，城市建设用地 22 平方公里，其中京广铁路以西占 15.96 平方公里，受小清河行洪区影响，以发展路西为主。

进入 21 世纪，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和小清河行洪区规划的调整，为良乡卫星城的水源和京广铁路东部的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发展条件。从 2001 年 11 月开始，房山区政府委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在编制《房山区区域规划》的同时，进行了卫星城总体规划第三次修编。并于 2003 年 7 月 22 日，经市政府市长办公会讨论通过。这次规划区总面积由原来的 78 平方公里扩大到 120 平方公里；城市建设区由 22 平方公里扩展为 35.96 平方公里；人口规模也从原来的 19.6 万人增加到 25 万—30 万人。从规划层面实现了良乡卫星城由小城镇向中等城市的扩展。也为 2005 年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北京市总体规划（2004—2020 年）》所确定的房山新城发展建设奠定了基础。

### 良乡卫星城的领导机构和工作情况

区委区政府于 1992 年 10 月 17 日成立了“良乡卫星城开发建设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组长由区长李庆余担任，顾问张成基（原人大常委会主任），常务副主任李炳田（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副组长翟鸿儒（区建委主任）。成员为计委、规



划局、公路局、土地局、供电局、电信局、水利局、良乡工委、良乡实业公司、区房地产开发公司等单位主要领导。办公室设在建委，翟鸿儒兼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人员由建委、土地局、规划局、良乡工委临时抽调。领导小组全权负责良乡卫星城规划开发建设，按照统一政策、统一规划、统一领导、统一管理、统一开发、统一绿化、统一出让的等原则，实行集中统一领导。领导小组成立后立即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坚持每月一次全体会议研究解决问题。到 1993 年底，仅用一年时间就完成投资 1.7 亿。西潞大街和良乡西的建成给卫星城开辟了一个新发展区域；西潞园居民小区的开发给人口东移准备了住宅；工业开发区基础设施的完成为招商引资打开了局面；夏庄水源地的开辟，将供水能力提高到 2 万吨。20 项单项工程的开工面积达到 14.4 万平方米，实现了一年起步的设想。

在此期间，区委常委会召开专项会议，对卫星城建设做出“十条决定”。四大部门领导 5 次听取情况汇报，并实地考察，对重点项目进行指导。为了进一步加大领导和协调工作的力度，1993 年初还增加区委副书记张朝星为副组长，增加财政局、科委、外经委、公安局、劳动局、工商局、长阳镇、官道乡、紫草坞乡为成员单位。1993 年初，将领导小组正式定名为“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卫星城规划开发建设领导小组”。

组长李庆余一年之内 8 次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会议，安排各项工作，解决各种问题，并组织有关部门筹集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争取各项支持。5 月 5 日隆重召开的由区各有关单位和良



乡镇、各村、中央市属驻良乡单位参加的“良乡卫星城规划建设动员会”。吹响了全面建设号角。常务副组长李炳田带领调查组，深入良乡地区 14 个村进行调研，听取意见。区委区政府转发了《关于妥善处理良乡卫星城开发建设与良乡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报告》。

1994 年，领导小组陆续制定有关政策法规，包括《良乡卫星城领导小组职责权限》《良乡卫星城城市规划管理暂行规定》《关于良乡卫星城建设项目审批权限和程序》《关于建设用地农转工安置试行办法》，使卫星城管理工作有章可循，促进管理规范，法制化。据统计，全年建设投资总额达 2.1 亿元，建设开复工面积 37.4 万平方米，比 1993 年增长 68.5%。

1995 年至 1996 年间，领导小组进行了调整，组长由区长焦志忠担任，顾问李炳田，常务副组长由区委办公室主任李瑞担任。增加房管局、环卫局、区建筑集团公司为成员单位。领导小组办事机构分设规划、征地拆迁、工程三个专业小组，开展业务工作。1995 年，实现总投资 2.63 亿元。开复工 44.5 万平方米。完成 11 万千伏安变电站，长虹路、南护城河改造，刺猬河公园一期等基础设施，西潞园小区完工并入住使用，922 路公交车通车。还完成了良乡卫星城地名总体规划，并获得市里通过。

1996 年是开始实施良乡卫星城“九五计划”的第一年。区委区政府提出了卫星城建设“一年升级，二年见效，三年基本建成”的工作目标，各方建设都加大了力度。



1996年7月5日,市长李其炎到良乡视察了西潞园小区的建设和物业管理工作。1996年9月,市委、市政府相继发文正式批复了房山区区址迁移的请示。12月31日,区四大部门办公楼隆重奠基。区址迁移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为了加快卫星城建设,进一步提高办事效率,1997年10月27日,第33次区长办公会决定再次调整办事机构。成立“良乡卫星城建设管理委员会”,并通过组织部抽调各有关单位的干部组成事务部、土地规划部、工程部、计划招商部、总工室等专业办事机构。1996—1998年逐年建设总投资分别达到2.65亿元、2.68亿元、5.25亿元;开复工面积分别达到32.5万平方米、38.2万平方米、61万平方米。同时区直机关多数单位也具备了在良乡办公的能力。行宫小区和北潞园小区一期工程陆续建成。政通路集中供热锅炉房建成,电信大楼投入使用。具有卫星城中轴线标志的拱辰大街拓宽改造完成后,城市中心区三纵三横道路格局已经确立。

1998年11月18日,房山区举行了四大部门办公楼落成和区府东移庆典。良乡卫星城的开发建设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破。

随着良乡卫星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成,区委区政府把“建设精品,带动全区”作为全区发展的重大战略,还提出了建设以良乡为中心,连同周边乡镇在内的良乡经济圈的战略构想。1999年4月6日,市政府正式批准良乡为北京市小城镇建设试点。9月13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良乡为国务院小城镇



综合改革试点，进一步加速了卫星城的发展。

经过 7 年建设，良乡卫星城已经具有相当规模。建成区的管理工作逐步走上正常轨道。临时性的管理体制已不适应卫星城发展形势。2000 年 1 月 25 日，区委区政府于宣布撤销“良乡卫星城建设管理委员会”，组建了良乡卫星城规划建设委员会。由区长任主任，副区长梁顺任常务副主任，良乡工委书记高培军任副主任，办公室设在规划局。实现了卫星城建设由速度型向精品效益型转变，城市建设格局由分散建设向相对集中转变，城市管理工作由被动型向主动超前转变。除了市政基础设施的完善，城市整体环境的绿化美化，文教卫生事业也有了更快发展，良乡卫星城以崭新的面貌跨入了新世纪。

随着《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 年）》的实施，《房山新城规划（2005 年—2020 年）》于 2005 年 12 月编制完成，并于 2007 年 1 月 5 日由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和市委专题会议审议通过。良乡卫星城完成了历史使命，成为房山新城良乡组团的一部分，纳入了国际化大都市的建设范畴。



## 为山区百姓创造幸福和光明的使者

——20 世纪 70 年代北京市汽车运输公司支农队  
支援六渡公社山区建设纪实

隗合福\*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各级政府十分重视百姓的生产生活。改善生产条件，提高生活质量，是各级政府的重点工作之一。作为首都北京，特别是远近郊区为百姓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是市、县政府的首要任务。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北京市政府先后为郊区特别是深山区实施了山区引水工程和山区照明工程。房山县的六渡公社是房山县山区最小的公社，也是最偏僻的公社。有 6 个自然村（六渡村、七渡村、西关上村、五合村、王老铺村、栗元厂村），27 个生产队，3100 多人，当时 6 个村生活最大的不便就是交通问题、村民生活饮用水问题和两个半村没有通电问题。

六渡公社各村，特别是王老铺村、栗元厂村和五合村的两个生产队村民饮水问题、照明问题亟待解决。房山县政府根据

---

\* 隗合福：房山区六渡公社原干部



六渡公社实际情况，分配北京市汽车运输公司支援六渡公社。

1970年初，北京市汽车运输公司首先派出以公司张宗仁同志为队长的第一批支农队，共有6名支农队员，从公司下属各场抽调。第一批支农后，从第二批继续，安排一个场为一批，根据工程需要选配所需技术人员，大约两年或两年多轮换一次。第二批为运输公司驻怀柔的十三场，派出以朱荣先为队长的6名队员。先后还有驻海淀清河的一批、驻丰台长辛店一批……最后是驻房山的十一场。各批都有不同时期的工程任务和续建任务，根据工程任务选派各类技术人员，到改革开放后的1983年末1984年初，逐步退出支农任务。

当时六渡公社6个村的村民饮水情况是：六渡村700多人口，仅有的村中和村西两口老水井，均为浅表水，每年雨季井水浑浊，用水桶打上来，桶底是一层沙子，水面杂物多且水质极差，时常浑浊得不能饮用，尽管如此，全村人整天还得排队打水；七渡村、西关上村沿拒马河居住，祖祖辈辈饮用拒马河水，上游村连村、户连户，洗衣做饭及园田浇地施肥，造成水源污染，引发的疾病时有发生；五合村两个生产队（一、二队），虽然有一处山泉自来水，因村民居住分散，只能从这唯一一处山泉水出水口挑水，极不方便；最为困难的还是远离六渡25华里的王老铺村，和20多华里的栗元厂村及远离五合村的東西山顶两个生产队。王老铺村全村7个生产队，方圆40里，居住在七沟八梁多面坡，虽然有些住户距离水源近些，也只能供给自家和周边少数村民享用，遇上旱年，还时常断水；多数



住户远离水源，方圆几里或十几里路，靠人挑驴驮，遇上旱季水源还时常断流，夏季水源时常被洪水或泥石流淹没。

1970 年春节后，6 名支农队员初到公社，听取了主管领导齐德富同志（主管副主任）介绍全公社基本情况后，张宗仁队长坐不住了，急于带着队员到两个半村实地查看。由于当时去王老铺村、栗元厂村不通公路，第二天，由齐德富副主任和公社两名干部带领支农队员走便道上山去王老铺村、栗元厂村。作为在大城市工作多年的人，初来这么偏僻的小山村，深切体验到深山区老百姓生活的不便。

70 年代初这两个村不通电，张宗仁队长决定，先解决村民的自流引水，由王老铺村几名村干部与支农队人员到最高处的水源地查看。随后又去栗元厂村，时任村党支部书记隗甫喜同志，大队长隗甫功同志带领支农队查看了最高处（地名叫沓晃港）的水源地。掌握了情况后，张宗仁队长比村干部还着急，决定还是回公司与主管领导汇报支农地六渡公社两个村群众饮水困难问题。张队长回到公司，将六渡公社情况向公司领导做了详细介绍。公司领导了解情况后当即决定，从各场收集水管物料全力支持，无私支援。由于六渡至王老铺村、栗元厂村不通公路，支农队将运来的水管和管件等物料，从 108 国道运送到霞云岭公社的石板台，然后由两村干部发动两村社员从石板台路口沿刺儿港沟往山上肩扛，扛到两村各自引水口。先后从栗元厂村地名叫沓晃港的水源地出水口架设 2 寸水管向下方的栗元厂村村民比较集中的地方自流引水，村民在居住比较集中



的空旷地挖水池储存或接上三通、水龙头向住户延伸，暂时方便了部分村民。到王老铺村时，从王老铺村地名叫黄根窑自流出水口，沿荒山野岭，架设 2 寸水管，将自流水引到第六生产队，第二生产队和第四生产队部分村民点，并延伸到第三生产队。因为当时没有修好蓄水池，只能将引入本生产队水管安装上三通分别引入各村民集中点，在村民集中点水管末端按上水龙头。紧接着又从地名叫大湖圈的自流出水口引到大队部左右、第六生产队和第三生产队连接上前期的水管，暂时缓解了一部分村民的饮水问题。这样也只能解决春、夏、秋三季使用，冬季怕水管冻裂，无法使用。但还有第四生产队部分高处居住的村民、第七生产队暂时无法解决。第五生产队在队长隗有全同志、指导员隗有瑞同志带领下，从高处一水源口向下引水。

第一生产队村民居住地附近有几处山泉水，夏季雨水充足时还可以自行解决，除特殊干旱基本能满足本队村民需求。栗元厂村第五生产队在队长穆殿玉同志、指导员蔡玉树同志带领下，从王老铺第三生产队的地名叫下儿水的水源出口架设水管向下引水，半路安装上三通分别引到住户穆殿文、穆殿武居住的集中点和下坑（地名）的集中住户附近，能解决本队大部分村民饮水。

第四生产队在队长隗有旺、指导员隗永林同志带领下，也从地名叫西沓晃港一小出水口引水，因此地夏季雨水充足时水源也比较充足，将出水口扩大成一个大水池，由小西沟向下引水，沿路引向名叫西坨的第三生产队，这样大多数用户都能用



上饮用水，继续经过地名叫大战坨再接上三通，一条引到第四生产队居住的头道沟，另一条引到大黄捏子。分别在住户集中点挖了多个小水池或水管末端接上水龙头，此后基本上不用牲口驮水了。

五合村的第三生产队（地名叫槐疙瘩）因地势高且没有引水的充足水源，暂时无法解决。

五合村第四生产队（俗称黄捏子）是在王老铺、栗元厂两个村自流引水基本完成后，最后搞的引水。据时任生产队长刘殿稳同志回忆说：“1973年春季开始，还是由支农队帮着搞的自流引水。搞自流引水前，除地名叫上站的一处水源充足，其他住户附近有少量山泉渗水眼，勉强够附近住户用，如遇上旱年，全队各户村民只能到山下河沟一处小水坑用毛驴驮水，或到王老铺村一处小水眼驮水，与王老铺第一生产队村民争水吃。当时社员知道王老铺村、栗元厂村已经解决了大部分村民的引水问题，听说也要为他们解决吃水难问题，社员积极性非常高。”刘殿稳同志说：“我们生产队只有11户人家，50多口人，居住在三道山梁三道沟，居住极为分散。为了解决吃水，家家都养了一头毛驴，每天天不亮就赶着毛驴去驮水，有时因为驮水影响大人上工，或者影响孩子上学。当时为解决我们生产队各户饮水问题，支农队一姓王的支农队长、姓杜的和姓赵的两名年轻队员，由我们队干部带领他们查看了位于当地最高处上站（地名）的水源地，发现此地水源充足，基本能引到下方的各家各户，随后计算了从水源地到各家各户需用的水管、管件，



王队长带领队员回场拉运物料。我和指导员蔡玉海同志与几名社员跟随支农队从海淀区清河的场里装运，将水管及管件运到五合村，然后由生产队全体社员利用每天晚上到大队开会（当时特殊年代每天晚上开会）散会后每人扛两根，就这样将 2 寸和 1 寸半及 1 寸的水管扛回来的。因位于上站的水源地地势较高，各家各户居住地势较低，除地名叫炕儿站的一户（刘殿久家）外，都能将水引到各家各户。当时，生产队的驴骡由饲养员兼牲口把式蔡玉全同志负责，从六渡、五合村驮砂石料、水泥，送到各家，各家再利用晚上和夜间发动全家自修蓄水池。白天全体社员全力以赴协助支农队向各家架设水管。水管架设到各家各户后，先接上水龙头用上引用水，待自家蓄水池修好后开始放水。就这样，在支农队的无私支援下，除 1（刘殿久）户外，家家户户吃上了清澈干净的山泉自流水，大大方便了群众生活。”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前，王老铺村、栗元厂村、五合村的三队、四队，方圆几十里一到傍晚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天一黑老人小孩从不敢出家门，因为没有电。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大人收工回家，还是孩子放学回家，吃完晚饭无论几点就上炕睡觉。

在支农队张宗仁队长带领支农队员为两村解决饮水的同时，由于没有通电，极不方便。他白天带领队员架管施工，晚上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就与队员们琢磨如何为这里的百姓解决电的问题。



1972年年初的一天，张宗仁队长下山，回公社找齐德富副主任商量，决心为这里的群众解决照明问题。张宗仁队长与齐德富副主任几次与县电力局领导协商，都答复因为远离高压线路，路途远，投资大，工程量大，无年度架电计划等无法解决。最后一次张宗仁队长急了，与时任电力局刘正宜局长说：“刘局长，咱们生活工作在大小城市或是平原，有电有水，什么都方便，可你知道山区的百姓没电是什么滋味吗？你知道他们的生活有多难吗？他们祖祖辈辈始终在没有电的黑夜摸黑。您是管电的，在您管辖的山区百姓没电，生产生活这么艰苦，难道您就没责任吗？我是支农的，是响应市政府号召来房山支农的，我是支农队长，不给他们解决照明问题，我也是有责任的，我已下决心了，您就看着办吧。”他紧接着说，“刘局长，您只要给我（伸出大拇指与二拇指比画着）这么长的电线，我就能给他们解决照明问题。您今天不答复，我明天再来，直到您答复为止。”由于公社领导与张队长几次上门诉说当地百姓照明问题，特别是张队长的这一席话，打动了刘正宜局长。刘局长说：“我工作这么多年，还真没见过你这么执着为百姓办事的，看来我不答复你是不成了。那好吧，同意给他们解决供电，但要等我们商量以后，向市里打报告，要由市里做年度计划。”张宗仁队长说：“您是局长，您决定了不就行了吗，还商量什么？”刘局长说：“这么大工程，是要有年度计划的。”张队长说：“明年给我们做计划，今年我们就先行动着。”刘局长没有答复也没有反对。这时，张队长心里有谱了，他等不



及了，想趁热打铁。他想，毕竟我是为你们房山的百姓办事，不是为我个人，答复了就赶紧办，就是不合规也不会犯大错误。随后的几天内，他就紧锣密鼓带领支农队员们与村里派出跟车的社员来到电力局，又找到刘局长，张队长说：“我今天就是来拉料的，汽车和装卸工都已经来了，就在外面等着呢。”刘局长说：“我不是说等我向市里打报告做明年计划吗？”张队长说：“您是局长，别让我们等明年了，您知道没电照明的老百姓多盼望早日通电吗？”刘局长还真佩服张队长这种精神，他只能同意了。随后他让有关人员办理相关手续，将电力局库房为别处架电的电料先给了他们，将他们所需的电料，路边 10 米和 8 米两种规格的电线杆先运走。由于张宗仁队长事先与房山的十一场领导打了招呼，动用了十一场挂斗汽车运送物料。因没有年度计划，只能边运物料，边与电力局领导交涉，逐步将事先计划的两个半村需用的所有高压和低压物料，用十一场挂斗运输车从 108 国道一车车运送到了霞云岭石板台路口。再由两村所有男女劳动力从刺儿港沟向上抬运。

由于张宗仁队长为两村争得了架电，不久的将来村民就能通电照明了，时任王老铺村党支部书记隗有义同志召开了村党支部委、各生产队长会议，通报了为村里架电的事，村、队干部们积极性很高。栗元厂村也是如此，召开村、队干部会议通报情况，生产队干部分别对村民进行了动员，调动了村民的积极性。村民们了解到张宗仁队长这样为我们争取架电，都很感动。各队社员一致表示，无论多苦多难也要把电架到各家各户。各



生产队在保证春播夏锄秋收的情况下，除老弱病残，全力以赴投入到架电施工任务上来。

由于霞云岭石板台村刺儿港沟口与王老铺村、栗元厂村直上直下 10 多华里，村里人还真没干过这么艰苦的活儿。经村干部、队干部反复协商，凭着以往经验，凑齐大绳木杠，发动全体男女劳力齐上阵，能抬的上肩抬，不能抬的，前边拉纤。

第一天，村民们一大早带上干粮就到了刺儿港沟口等候。这次要十几人抬一根 10 米和 8 米长的水泥笔直线杆，只能走直路。当时刺儿港沟只有日常行人走出的弯弯曲曲的小路，众人抬这么长的电线杆，必须步调一致才能前行。路途不仅直上直下，还要经过悬崖峭壁，坑坑洼洼的山林乱石，根本没有现成路可走，抬运这么重、这么长的水泥线杆，上千斤重的大盘高压线，一吨多重的大变压器，只能人抬着前拉后推，谈何容易。一段时间，王老铺村、栗元厂村、五合村三、四生产队全体男女劳动力上百人全部汇聚到石板台至王二岭的刺儿港沟。抬杆的抬杆，拉纤的拉纤，大家齐心协力一步步向上攀登。有人喊着口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有的边抬边拉纤，还边唱着下定决心的语录歌，士气十足。一时间，整个刺儿港沟是一片欢声笑语的热闹场景。10 多天时间，运输车辆随时拉运，发动村民随时抬运。经过半个多月，所有大小线杆、大盘高压线、大小变压器顺利运送到王二岭。

在将所有架电设施抬运到王二岭后，又兵分两路，各奔东西，奔向各自的山梁。栗元厂村从嘎勒港一路跨过多座大小山



梁，到三队大站坨再到大黄捏子，沿东西山梁，将高压低压线路遍布家家户户。王老铺村从王二岭沿各大山梁将高压低压输送到了方圆 40 里 7 个生产队 200 多户住户附近。直到今日，仍有村民说，那时也真邪了，干活就像不要命似的，那时的人也不知哪来的那么一股子劲，每天晚上开会，白天带上干粮，老早就到了施工工地，还不时地喊着当时“学大寨，搞比赛；学雷锋，见行动”的口号，穿梭在东西山梁上。从不叫苦叫累，身上都有一股永远用不完的劲。

此时霞云岭公社石板台村刺儿港是村里的一个生产队，早已通了低压电，家家户户早已有照明。这次需沿路架设高压，10 米电线杆至少需 16 人抬，8 米电线杆至少需 12 人抬，还要几十人拉纤，前方必须有人先趟出一条路。有时一天只能抬一根，遇上偏远的高山头，花一天时间都抬不到。由于架设高压线路，按操作规程需将电线杆及大盘高压线运送到各个大小山头，就更是难上加难，根本没有也用不上先进设备，只能用传统的笨办法。勤劳朴实的两村村民在两村村干部带领下，在支农队各位师傅的指导下，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一根根高压电线杆、一盘盘高压线，穿越一片片茂密的树林、一块块庄稼地，运送到了各个山梁，将一台台变压器运送到了指定地点。

因为架设高压是永久性的工程，技术人员严格工程质量，严格操作规程，无论多艰险、多艰难也要把线杆运送到指定地点。高压线的跨度、斜度、弯度是有严格规定的，需在各指定地点的山梁的岩石上，深挖硬凿出 10 米杆的 1.5 米深、1.2 米



见方的电线杆坑，8 米线杆要深凿出 1.2 米深、1 米见方的电线杆坑和所有拉纤坑，确保永远竖立，万无一失，实属不易。需将整盘上千斤甚至几千斤重的高压线架设到各大山梁的线杆上，又延伸到对面几十米或上百米甚至一二百米的山梁。将盘线滚动着穿越茂密的山林、坑洼的山谷乱石滩，需经过大小山梁甚至悬崖峭壁，在山林里钻来钻去，至今都难以想象当时勤劳智慧的村干部想出怎样的笨办法，带领勤劳朴实的村民完成这样艰巨工程的。

经过一年多时间，历尽千辛万苦、千难万险完成了为两村东南西北大小山梁架设高压任务。在市、县政府为山区解决照明工程开始实施前，使部分村民提前一年多享受上了用电照明。

自 1975 年起，根据市、县政府实施山区照明工程部署，为边远生产队各家各户送电照明。此时，王老铺村电工徐广恩同志已调入公社，负责全公社供电工作。他为王老铺村、栗元厂村实施户户照明上下奔走，多次与两个村村干部（王老铺村党支部书记隗有义同志、栗元厂村大队长隗甫功同志）一起到县电力局寻求支持，帮助解决物料（低压线、低压线杆、横担、入户电灯线、电表等），彻底为村民解决户户通电问题。

为解决两村及五合村两个生产队村民照明，在徐广恩同志不懈的努力下，电力局给予了大量物资支援。由于电力局的物料支援与技术人员支持（由电力局派出吴常芦、马新春两位电工），还有支农队技术人员以及各村电工（有栗元厂村隗永仓、王老铺村李廷才、七渡村刘贵甫、五合村刘玉合、六渡村穆甫贵、



蔡玉德，西关上村李廷云）一起，又用了 1 年多的时间为王老铺村、栗元厂村各个生产队以及五合村两个生产队架设低压到户，终于让所有村民通了电。结束了全公社所有村民祖祖辈辈没电摸黑的历史。

20 世纪 70 年代的架电工程，到如今 50 多年过去了，当年架设的高压、低压线路，至今仍在正常使用。可以想象，当时支农队的师傅们、电力局的师傅们，我们的上辈们冒着严寒酷暑架设的高压、低压线路质量是多么过硬，他们的奋斗精神是多么可贵！



## 河套沟第一辆汽车

周学英\*

河套沟，东至青龙湖镇的坨里，西至霞云岭，全长百余华里。域内大石河自西向东流经霞云岭、南窖、大安山、佛子庄、河北、青龙湖等乡镇。因河套沟地处山区，河水流域广而多绝崖深壑，河道环曲窄狭，故称“河套沟”（今称房山区北沟）。

1956年下半年，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期，河北地区（河北镇）东庄子至口儿4乡12村的14个初级农业合作社合并成立高级社，名为“永成社”，社长是檀木港村的王江。磁家务、黄土坡2乡7村的初级合作社合并为“永顺社”，高级社隶属京西矿区河北区管辖。

永成社成立后，将社内东庄子村南坡个体开的石板山收归集体所有，并在村南建房成立“副业队”。又将各村村民入社的大车（用骡马拉的）集中在东庄子村，成立“大车队”。大车由大车队统一经营管理，负责社内农产品、工副业产品以及社员生产生活所需物资的运输。

---

\* 周学英：房山区河北镇河东村党支部原书记



永成社不但抓农业生产还要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副业队成立后，务工人员不断增加，生产的青石板、磨刀石、文化板、缸盖、砚台等产品显著增多。初始，各种产品靠大车运往京城销售，每挂车载重 1 吨，到北京往返需三天时间，产品运不出去而多有积压。靠大车队 10 多挂车长途运输，已不适应快速发展的经济形势。

古人云：“行远道者假于车，济江海者因于舟。”而高级社经济的发展，交通运输须作先行。为使产品不积压，就要借助车，这车不是这种“大车”，而是汽车。故 1957 年秋，永成社从北京邮电学院购买了一辆美国生产的“万国”牌汽车。此车 10 轮，载重 5 吨。汽车买好后，由邮电学院下放干部韩新银将车开回。汽车为副业队而买，为副业队服务，主要运输副业队生产的石材。为了用车方便，将车停放在副业队院内，产品可随时装车运走。从而，永成社日夜翘企着有一辆汽车运输的愿望终于实现。

永成高级社买汽车的消息不胫而走，上下连村以及在石板山干活和附近种地的人们都时不时地进院内观看，那又高又大的汽车好似一巨大的铁牛趴在地上，显得十分威武气派。当听说汽车一次能拉 5 吨，连装带卸往返京城不到一天时间、运输能力超过大车队十几挂大车时，人们无不欢欣鼓舞。人们不再因生产的石材运不出去而发愁犯难了。同时，人们为永成社有了汽车也是河套沟有了第一辆载重汽车感到骄傲和自豪。

永成社买回汽车后，很快投入运营。当时，山区路况处于



非常落后的状态，突出特点是坡陡、路窄、弯急，不同于现在的公路。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大都是经由乱石密布的河滩曲折向前延伸的。汽车每天从东庄子副业队装货，运送到北京文化用品公司仓库，全程 100 华里。然而，仅从副业队到坨里 20 华里的路程，其路线迂回曲折，时而溪南，时而谷北，坑坎不平的河滩路，冬季冰雪，夏季雨水泥泞，还要穿越 18 道河弯。即便是出山入川至京城也大多是坎坷不平的土路，很难行驶。

司机韩师傅，是外乡人，对山里路况不熟，且又是长途开车运输，一人驾车整日颠簸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非常疲劳。1957 年 10 月，为配备力量，时任河北乡党委书记张成基，从良乡手工业联社（房山工业局前身）将 1 名司机（付成）调到河北，成为“万国”汽车的司机，与韩师傅同驾一辆车。

付成，河北镇河东村人，到河北镇之前，已有 2 年驾龄，可以说是是一有一定经验的年轻驾驶员。两个月后，韩师傅辞职，“万国”汽车由付成师傅一人驾驶，他成为本乡本土也是河套沟第一个汽车司机。当时，副业队生产的石材呈购销两旺态势。尤其是四边相木框的文化板，没有“落地”的。文化板分四种型号：1 号板最大，长 30cm，宽 15cm；2 号板长 25cm，宽 13cm；3 号板长 23cm，宽 12cm；4 号板最小，长 20cm，宽 12cm。框宽均为 3cm，厚为 1cm。产品 12 块板为 1 打，10 打 120 块算 1 件，用草绳捆好裹严。大板 1 件重 90 多斤，小板 1 件重三四十斤。砚台也由原来 10 块 1 捆改为 100 块装箱，石材产品市场走俏热销。“万国”汽车块头大，有劲显神威。两



个装卸工将 5 吨左右的石材装得满满的，几乎每天都要进京送货。

1958 年 9 月，河北地区由高级社向人民公社过渡，成立花果山人民公社。两个月后，花果山人民公社与百花山人民公社合并，成立百花山人民公社。1959 年 11 月，改称河北人民公社。公社上至秋林铺，下至磁家务，整个河套沟跨度 150 华里，规模大，时称“大公社”。

在人民公社成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公社虽经几易其名，万国车均归公社所有，由公社统一调配使用。特别是在大公社时期，汽车除运输石料厂（原副业队）生产的石材外，还常拉人员到河北、房山、北京等地开会、参观、学习。

随着时代的发展，石料厂作为社办企业，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务工人员，因而石材产量不断增加，汽车运输也更为繁忙。一个司机出车驾驶时间长觉得疲惫。故增加了河南村 1 名司机孔祥余与付成合开“万国”汽车。两位师傅人歇车不歇，将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往京城，销售收入明显增加。

1961 年 6 月，按照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以及贯彻落实《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精神，房山县调整公社规模，公社体制缩小，全县由原来的 7 个大公社，调整为 32 个公社。原河北公社以 6 个管理区为基础，划分为河北、长操、南窖、佛子庄、大安山、史家营 6 个公社，河北公社辖口儿、河北、磁家务等 19 个大队（村）。

公社体制缩小后，由大公社管理使用的“万国”汽车，重



归河北公社（今河北镇）所有。其间，该汽车一直不停地为石料厂运输石材。当时，河北地区未建生猪收购站，为方便群众，增加社员收入，“万国”汽车还多次为社员拉生猪到北京大红门屠宰厂销售。

1963年后，石料厂扩大生产规模，资源进一步开发，在原有基础上，在东庄子南坡后山的平推、大北岭，新开采石板塘坑四五个，务工人员由200人增加到近300人，石材产量大幅度增加。

“万国”汽车车箱长7.5m、宽2.3m、高1m，两侧槽帮打不开，是固定的，称“死槽帮”，只有后面的槽帮可以打开放下。所以，装卸货物时，靠装卸工人背肩扛，十分劳累辛苦。

“万国”汽车机械性能好、功能多，前后轮驱动，车皮实、有劲。运输途中很少出故障。另在车头的保险杠上，还设置安装了一个绞盘，如果车陷进泥塘或深坑、沟里，将绞盘上的钢丝绳一头拴在一棵大树上，开动绞盘，车便自动爬上来。1958年9月，“万国”汽车为修密云水库的人员运送生活用品，在雨后泥泞的黄土路上，就是靠绞盘多次将车从泥潭里拖出来，顺利地完成任务。

“万国”汽车非常忙，没有闲暇之日，除为石料厂运输石材外，还为其他企业服务：为红旗煤矿运送坑木，为林厂拉水抗旱，为修配厂运原材料，为石灰厂运输石灰等。当时只有一辆汽车，车少用户多，为不误运输，不耽误生产，汽车由公社副业组调度，当时尽管安排周到缜密，仍不免出现临时、紧急



用车之事。根据轻重缓急原则，协调进行解决，大多情况下司机胸怀大局，加班加点，不计报酬，为集体着想。

1963年至1968年，随着石料厂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务工人员快速增多，加之各企业产品的销售和原材料的加快采购等原因，用车需求持续攀升。为此，石料厂又购进一辆车头大、当地人称“大脑袋”的捷克生产的汽车，并增加了南车营村两名驾驶员谢全道和张广会师傅。“万国”汽车由付成和谢全道驾驶，捷克车由孔祥余和张广会驾驶。老大哥“万国”汽车“车先士卒”，带领兄弟“捷克”车往北京运石材，往北京陶然亭灰膏厂运石灰。返回时到顺义体育用品厂、大红门木材经销处、朝阳门外青年路、大红门竹木厂、西直门坑木厂等地拉回企业用的木材和圆木，称“来回脚”。

1968年4月，阎东公路的坨里至东庄子路段油路面工程开工，当年9月底竣工。至1971年，三年多里，“万国”汽车出山入川，行驶在平坦而又新铺油的公路上，不再东摇西晃，上下颠簸，从此路好走了。然而，在那段时间，市场对各种石材的需求更大，特别是以主打产品的相框文化板，近供京畿，远销津冀鲁，供不应求。除往京城运送外，还要往良乡火车站运文化板。因需求量大，40华里的路程，由每天两趟活增加到三趟，最多一天跑四趟，累得人困车乏。

“万国”汽车老了，跑不动了。1970年至1972年，付成和孔祥余师傅不分昼夜对其多次进行维修保养，因买不到零件，故将10轮改装为6轮，后又将发放机改为解放牌发动机。经



改装后的“万国”汽车比改装前的原装车，精密度和安全系数要低，而且载重量明显减少，车速也慢了许多。

1972年至1973年，河北公社文化板厂（石料厂1969年更名为文化板厂）相继购买了两辆嘎斯和一辆解放牌汽车。改装后的“万国”汽车运营一段时间后，于1972年秋趴窝停运，后作售卖处理。至此，运营了15年的“万国”汽车下了岗，结束了其历史使命。

作为河套沟第一辆汽车，于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为河北地区服务，为百姓服务，为石料厂服务。尤其是在当时产品积压，山区道路又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万国”车顶风冒雪，源源不断地将企业生产的石材运出山沟，销往全国各地，满足市场需求。物流畅通对经济的发展起着直接的促进作用，带来了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百姓收入持续增加，生活水平显著提高。15年来，在为其服务的石料厂，成为河北公社众多企业的支柱产业，每年都要向公社上缴利润，最多一年曾上缴40万元，成为公社的骨干企业。

回顾那个年代，“万国”汽车，对企业的发展，经济的腾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万国”汽车贡献大，功不可没。